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

殷倩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作者简介



殷 倩（1986年2月—），山东济宁人，硕士就读于南开大学，博士就读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在核心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中国问题”辨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及其历史启示》《劳资利益表达的均衡》等多篇学术论文，多次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主持完成多项省市级社科项目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

殷倩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 / 殷倩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17-3079-4

I. ①马…

II. ①殷…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9682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薛迎春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6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17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问题”	22
第一节 历史任务及其探索	23
第二节 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	30
第三节 赢得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	34
第二章 共产党人的早期理论探索	39
第一节 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	39
第二节 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	50
第三节 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	59
第四节 初步确立了正确的理论态度	64
第三章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	70
第一节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消极影响	70
第二节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积极影响	78

第四章 社会思潮与理论论争的推动	87
第一节 主要的理论论争	87
第二节 中国化思潮	10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理论内涵	10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和本意	10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与地位确立	118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启示	128
结 语	146
参考文献	148

导 论

本书从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问题”、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四个层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及现实启示。

一、研究述评

本书主要述评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等，在分析现有研究成果得失的基础上确定本书研究的问题和重点。

（一）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研究

1.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的述评。目前学界鲜有直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为题的研究成果，多直接

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背景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仅仅关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条件。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共产国际七大适时、果断地做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倡导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策，及时有效地指导了各国共产党策略上的转变；要求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指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① 也有学者专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资源，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学术界对理论研究达成了“中国化”共识。^②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战时期，在全民民族主义高扬的背景下，以其严谨的论述迎合了当时部分党员干部的抗战决心。这种理论在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更是具有鼓动性，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它不过是毛泽东为彻底打倒留苏派的战略口号。^③

另一类研究成果则立足中国近代史，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依据是中国国情；实践根基

① 张富文《共产国际七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第5期，第25页。

② 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第22页。

③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版。

是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文化底蕴是扬弃中国历史遗产。^①有的学者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主题，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有的研究以中国近代史为纲，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发展、形成史。^②聂家华教授指出抗战时期民族化思潮的兴起、共产国际工作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③

综上，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直接以此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回答其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立论之本。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路径过于僵化：一条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的高度上去论证历史必然性，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另一条思路是从历史实证主义的角度论证，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历史实然解释历史必然，缺少学理性逻辑分析。这些回答不但没能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来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回到当时的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实境中去。所以必须回到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中去，走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初现场”，从社会现实、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等维度去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

其二，即便是涉及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从提出马克思主

① 郑德荣、王占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内涵及重大意义》，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第24—29页。

② 孙建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史研究（1898—1940）》，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6月。

③ 聂家华、王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发展轨迹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第40—45页。

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去审视社会历史条件，忽略了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因素的多维性与过程性，从而不能客观地、历史地回答“为什么提出”、“怎么提出的”、“怎样实现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阐明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这一命题提出的历史性、过程性、必然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有其深刻条件，这一理论创造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发展并成为全党共识的历史过程。所以，对其缘起的研究，必须回到中国近现代史，回到整个中国现代化大潮中去全面立体、客观、过程性地分析其历史性、逻辑性和规律性。

2. 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的述评。海外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多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目的。主要分为两类观点：其一是权力斗争说。代表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是权力斗争，是为了个人权力最大化、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修改。西方学者的这一倾向性在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一篇文章中也可获得佐证，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为了同留俄派进行权力斗争的产物，基于权力斗争下的“中国化”理论自然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其实际意义是“中国化”理论的确战胜了留俄派理论，随之留俄派权力地位下降。^①当然，部分海外学者也能够客观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如雷蒙德·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简洁概念巧妙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向当时的中国民众介绍来自于国外的政治理论，而且也使中国共产党开展自己的历史研究。因此，不能把这一概念简

① \ [澳\] 尼克·奈特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应一译，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单化为当时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这样有失公允。^① 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也曾客观地指出：“中共思想史实际上是探索中国革命进程的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共历史上各种派别和倾向的斗争，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归到这个问题上。这种斗争无论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做掩饰，其中发生的冲突和出现的种种转折究其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此。”^②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一种民族论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支配而强调民族主义的体现。费正清、施拉姆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在施拉姆看来，“中国化”在应对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是一种伸张民族尊严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既可以用于党内斗争，也可以在危急关头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迎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落脚在毛泽东个人娴熟的历史知识结构中，“中国化”更是一种坚定的内心信念，即任何外来理论形态，如果不能带有中国气息，就绝不会在中国土壤中发挥作用。^③ 费正清也认为“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功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④ 当然也有海外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民粹主

① \ [美\] 雷蒙德·怀利 《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② \ [俄\] 费奥克蒂斯托夫 《邓小平1983—1987年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马贵凡译，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③ \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2页。

④ 洪俊峰 《西方学者论毛泽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义的表现。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认为毛泽东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但是，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① 斯拉姆也曾指出：“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国化还是刘少奇的民族化，都意味着在许多不同层次上适应本民族现实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作为口号，可以在迎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关头。”^②

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原因及目的的具体表述虽然不同，但大都直指其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为了树立其自身精神导师的地位。即使不论意识形态以及阶级立场的差异，仅从这些结论得出的思维逻辑去看，它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夸大了历史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仅仅看作是毛泽东用于政治斗争的理论工具，忽略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等客观因素。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毛泽东只是为了追求和巩固个人权力手段的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偏差太大。而且西方学者这一逻辑的荒谬还在于它无力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共指导原则，并在后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这样一种无视历史与现实以及论证逻辑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客观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以还原历史真相。

① [美] 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② \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另外，海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只是关注毛泽东的个人贡献，而没有将其作为全党乃至全民在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探索中的经验总结。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倡导者、集大成者，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代表人物，但历史的发展不会是单线的，历史的舞台从来不是单单属于哪一个英雄人物的。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从中国近代史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关于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探索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日益增多。

1. 关于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有学者关注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客观条件。其中有利的主观条件是李大钊中西教育背景及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利的外部条件主要在于共产国际初期的正确指导和帮助。^① 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上。有学者具体指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共产主义思想介绍给中国人民；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的基本范式；坚持对中西文化辩证结合的立场，坚持完全了解和实际运用的科学态度，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② 更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③ 有

① 潘祥超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6月。

② 郭磊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江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7月。

③ 潘祥超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6月。

学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李大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顺利创建。”^① 其依据在于：李大钊初步阐释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当时一些歪曲唯物史观的观点；他还倡导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在于阶级斗争这条“金线”。^②

2. 关于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学界对于陈独秀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且研究内容也涉及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国共合作思想、晚年民主思想等。但直接研究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并不多见。那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却详述了陈独秀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过是非。有些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这些贡献集中地表现为：创办《新青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阵地；推动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社会基础；领导建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思想政治主体；参与领导国共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了现实道路。^③ 也有学者探索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指出陈独秀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领路人，在统一战线、建党等方面都对毛泽东有积

① 陈旭文《民主革命时期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理论学刊》2009年第9期，第38页。

② 王志刚《“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载《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3期，第49页。

③ 梁艳秋《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浙江农林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7月。

极影响。^① 另有学者指出了陈独秀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存在局限性，突出地表现为他在大革命过程中的过度妥协以及“二次革命论”。^②

3. 关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目前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建党思想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上。有学者指出，蔡和森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学习苏俄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③ 有的学者认为蔡和森是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且他的阐释较其他早期共产党人更具准确性、科学性和通俗化。^④ 有的学者指出，蔡和森是早期拥护建党的积极分子之一。^⑤ 有的学者论证，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影响了毛泽东和陈独秀。^⑥ 有的学者则全面分析了蔡和森的理论的内容，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前途、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等思想。^⑦

① 张艳凤 《陈独秀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7月。

② 梁艳秋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浙江农林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7月，第37页。

③ 彭凤荣 《蔡和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载《长沙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8—19页。

④ 李永春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5期，第53—60页。

⑤ 武可贤 《蔡和森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载《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37页。

⑥ 黄智亮 《建党前后的蔡和森建党思想及其影响》，载《攀登》1994年第3期，第73—75页。

⑦ 易永鹄 《蔡和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载《求索》2004年第12期，第226—229页。

4. 关于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目前明确以此为标题的文章与著作数量不足 30 篇，但是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如有学者论述了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历史贡献，分析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指出瞿秋白理论探索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受经验主义影响、缺乏深厚的农民运动的实践基础。^① 另有学者分析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过，认为瞿秋白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关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指导；最早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枢，支持澎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阐明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路径和方法；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民割据区域的思想。与此同时，文章还以“左”倾错误为例集中分析了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失误，认为瞿秋白在斗争策略问题上、革命性质问题上、土地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左”倾错误。“左”倾盲动错误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瞿秋白缺乏实践经验，另外政治魄力不足，导致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结论及苏联经验。^②

5. 关于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综述。学界近年来对张闻天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多关注张闻天的建党思想、经济思想、张闻天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统一战线的

① 柳国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6 页。

② 蒋霞：《论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4 年 7 月。

影响等内容。近几年来才出现直接以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克服“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推动与完善统一战线理论，厘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捍卫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了社会主义阶段论和根本任务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探索。^① 也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运用的贡献，明确指出张闻天的理论探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的理论贡献。^② 有学者重点分析了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指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内涵、实现途径、毛泽东思想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评价了这些探索与贡献对推动当时党内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也具有重要意义。^③ 另外，还有学者按照张闻天的生平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行划分：1917—1931年是选择、学习阶段；1931年回国至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失误与转变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1958年11月是成熟阶段；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至1976年病逝为逆境中的探

① 王向前 《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6月。

② 覃采萍 《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5页。

③ 张远新 《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第86页。